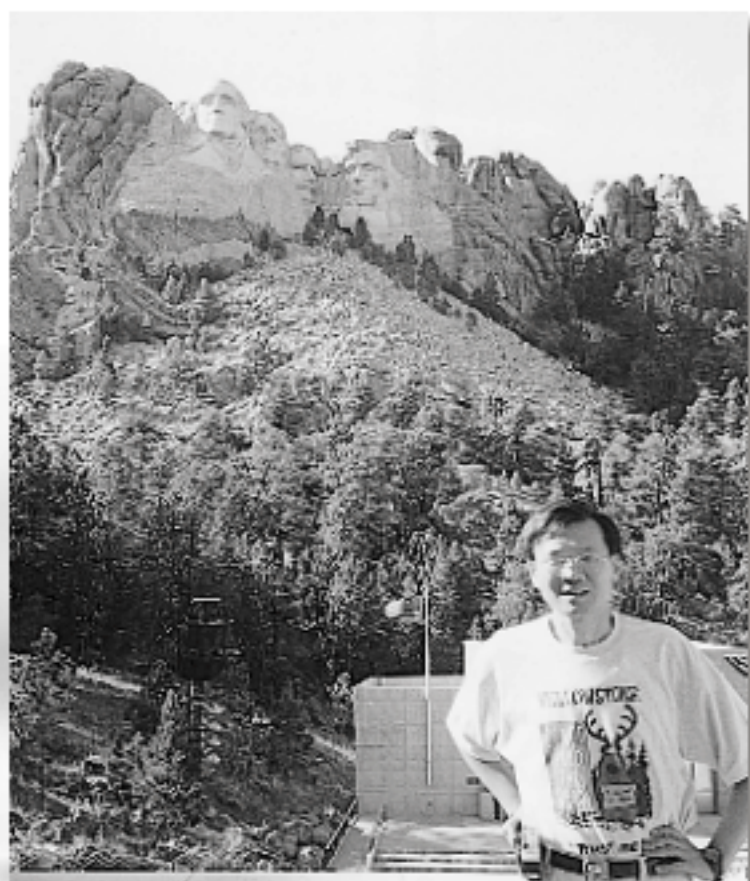


訪美紀行

李貽恒/醫學院心臟內科

其實早在醫學院畢業的時候，就有到美國去唸書的打算，當時也考過了FMGEMS。後來因為一些因素沒有成行；就直接進入了台灣的住院醫師和研究所教育，屈指算來到現在也有十二、三年了。這次有機會，可以放下手邊的工作，到美國待了一年，親自體驗了美國醫學院的臨床教育和實驗室訓練，對個人的影響與啟發，確實不小。除了專業領域的學習之外，美式文化的思考方式，也和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大異其趣。其中的感覺，在當時也許不怎麼愉快；但現在回想起來，卻也覺得非常有趣。因此在這裡就說說異鄉的故事，與君分享。

這次出去進修的地方是美國德州休士頓市的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我的大老闆Mark是內科部底下的心血管科學中心(Division of Cardiovascular Science)的主任，不知道是否因為研究的題目大多以臨床為導向，他的實驗室就設在醫院的六樓，緊鄰著護理部。目前研究的重點是小鼠(mice)的各種心血管疾病模式；其實說穿了，我待的那間實驗室，就是一所小鼠的心血管醫院，我們幾乎整天都在替小鼠做心臟超音波，做心電圖或量血壓；也經常利用手術的方式在小鼠身上製造心絞痛、心肌梗塞、心室肥厚和動脈硬化。因為小鼠的體積小(一般體重約20-30g)，心跳快(平均每分鐘約400-600下)，因此這一門技術就



變得很專業，沒有經過一定的訓練，是無法駕輕就熟的。大老闆底下，另外還各有一間專門做histopathology和molecular biology的實驗室，也各有一位教授和副教授負責，因此對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工具，在這裡是非常完備的。

我總覺得在美國，教授與教授，實驗室和實驗室或是科與科之間的隔閡很小。因為當前生物醫學的研究主流幾乎一切以基因為首是瞻，因此許多學科，根據其研究的重點，創造出各種基因轉殖鼠(transgenic mice)，為了瞭解這些基因變異小鼠的心血管生理功能，我們的研究就變得很重要。因此我們經常替各科，各實驗室送來的基

因轉殖鼠，量血壓，做超音波及心電圖，做各種手術或是經由頸靜脈插管來注射藥物。從來不會要求別的實驗室派人來自己做，因為他們還需要學習，重新熟悉這些技術，不如我們自己做出來的data可靠。當然，有些我們的檢體或是DNA，需要利用到較複雜的分生技術時，也會經常送到別人家的實驗室去做，其中的交流，非常順暢。我不知道這樣互利共生的文化是如何發展出來的，但確實是每間實驗室都盡量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與專長，而不需要十八般武藝樣樣俱全，但又什麼都不專精。有一次甚至還有人專程從東岸波士頓來，帶著他們的老鼠到我們實驗室，由我們手術製造心肌梗塞後，再打入stem cell。由此可見實驗室間的合作(collaboration)確實是提昇研究水準與層次的一個重要方法。

在美國實驗室裡的另一特色是各色人種，各種民族，各國訪客群集。我的大老闆Mark是猶太人，他特別喜歡歐洲來的學生和訪問者，因此六樓的實驗室裡，除了本地的白人、黑人、墨西哥人之外，德國人、波蘭人、希臘人和義大利人都有。我初進實驗室，發現竟然一個東方面孔都沒有，緊張了好一陣子，好幾天沒有辦法聽講半句中文，更感到痛苦；後來漸漸習慣，並且和帶我做實驗的一位印度裔講師(instructor)相處得很愉快。其實我發現，做人的原則，並不因膚

色、種族或地域有所差別；你若以誠信待人，樂於助人，大部分的人也皆會以此回報。

後來有一次到醫學院本身的大樓之某基礎醫學實驗室去拿老鼠時，赫然發現老中大多集中於此。一走進該實驗室，只見三三兩兩的老中，或聚集聊天，或埋首實驗；不時可以聽到「老張，最近研究搞得如何？」或是「小王，借你的機器打印一下」等中文，竟不自覺好像到了北京大學某實驗室，直到一黑人小姐出來招呼，才驚覺這裡是美國，不覺莞爾。我覺得世界各國的研究者，願意到美國來發展，貢獻自己的才智，除了個人的理由之外，主要是老美建立了一個基本上大致公平而客觀的學術舞台供大家盡情發揮。我的觀察，在醫學院裡，起碼在管理階層以下的競爭和升等，完全是依據個人的表現成績(performance)，少有其他不客觀的因素影響評分。申請grant或是升等時，committee的 member或是 reviewer的 comment，通常都會非常明確的指出申請者有待改進之處，並建議應如何改進。例如，教師的教學，學生評量反應不佳時，就會建議教師去參加增進教學技巧的課程；而提出的研究論文品質不佳時，也會建議應提昇至某類Journal的水準。帶我做實驗的老印，申請NIH的grant，被打回了票，其中一項建議就是instructor五年內，應至少有

2篇第一作者的論文才是適切的基本研究成果。一般很少看到「研究成果，尚待努力」，「教學服務，有待提昇」等不著邊際的comment。在美國建議改進的事項與目標，大多非常明確，因而使申請者得以受益，並擬定重新出發及努力的方向。

因為自己是臨床醫師，因此也特別注意醫院內的臨床與教學活動。美國的醫療環境和保險制度和台灣實在有天壤之別。我的小老闆George是貝勒的老人科主任，在美國以心血管系統的老化研究著稱；同時也是教學優良的老師，我看他編寫的老年醫學教材，確實精彩。他每週有一個半天的門診，某日中午一點多，我看他才回到辦公室，我客氣的問他說，「還沒吃中飯嗎？」他立即抱怨今天早上的門診實在太忙了，「我足足看了10位病人呢！」我心裡暗想，以我出國前的門診量而言，10位病人似乎少了點；不知是否因為他察覺了我臉上不自覺的流露出的不以爲然的表情，他立刻反問我「那你們在台灣，一診都看多少病人？」，我實在不好意思講得太多，「大約30-40位吧！」，他大驚失色的說「那病人不是進了診間，say hello就出去了。」我不知道，如果將我的小老闆放到台灣現實的醫療環境中，他還能不能在science上發表文章，或是繼續他熱衷的編寫教材和教學？其實大部分願意留在醫學院工作的同

仁，對教學與研究都抱有一份熱誠與執著，誰不希望和George一樣，做好研究與教學，同時可以花上半個小時對一位病人詳細的問診，做理學檢查，並且施以衛教？但是現在台灣的醫療環境和健保制度，可以讓我們這樣做嗎？和信醫院黃達夫院長在他所寫的「用心聆聽」這本書裡，寫得很好。他說「我們面對的是可貴的生命，因此在照顧病人時，怎能不秉持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兢兢業業地去處理每一個細節」，他又寫道「我很關心醫院的財務狀況，但是一所醫療機構必須在執行正當醫療的原則下，去追求財物的管理效率。如果必須犧牲醫療品質，以求生存的話，它就失去存在的意義了」。我不瞭解是否因為和信醫院的背後，有龐大的財團在支撐，才使得黃達夫院長可以堅守醫療的原則，抗拒外在不合理制度的壓迫。但是黃院長經營一所私人醫院，無法得到國家的補助，卻仍能以這種無畏的精神，替院內的醫師建立一個較有理想而有原則的工作環境，確實令人敬佩。

醫院內的內科教學活動，大致上的安排和我們類似。除了床邊教學和大講堂的活動之外，比較有特色的是對clerk至R1階層的新進醫師，所提供的lunch meeting。每個中午大約一個小時，邊吃邊聽。我想有2個主要的原因，使這個meeting的教學效果很好，幾乎沒看到有人在打瞌睡。其一是因

為吃飯時，手眼嘴需要協調，不容易入睡；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CR所安排的題目，都是臨床上非常實用的，例如，心肌梗塞的心電圖，抗生素的選擇，Arterial blood gas的判讀等等，上課的主治醫師講得都非常實際，對於這些新手的教學，一切以病人實際的情況出發，幾乎少有人討論最新的paper怎麼說；我自己聽了好幾個月，都覺得受用無窮，有溫故知新的感覺。畢竟新手開車上路，連轉彎，爬坡都不熟悉，就要他們知道太空梭怎麼飛，是有點強人所難；還是教好基本功夫，對新進者較有助益。

雖然在美國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對我一個在台灣求學工作近四十年的人來說，一下子進入美國的體系工作，不免時時有cultural shock。某日我帶著剛寫完的論文，去求見大老闆Mark，希望他幫忙看一看，修改一下；同時簽名後，送去Journal審查。Mark開門見山的問「你這篇文章，主要做了些什麼？」，我謹慎的回答，「我只是利用老鼠…(I just use the mice…)」，話還沒說完，Mark就嚴肅而急切地說「什麼叫做只是？(What do you mean by just?)你做的東西，別人沒有做過，就是獨特而重要的東西…」，後面那一大串英文，就已經不知道Mark在說什麼了；只記得他講的越來越快而且急促，我想Mark對我這種謙虛的態度，可能感到不解或是有點憤怒。雖然現在論文已經順利發

表，但Mark那時的一番訓示，讓我覺得，美式文化確實比較強調個人的特質和成就，和我們傳統儒家文化所重視的謙虛，合群有所不同。我常想，如果我要在美國的職場上奮鬥，恐怕必須由內心開始徹底改變某些想法和做法，才能生存下去；同樣的道理，台灣若要全盤移植美國的制度，而絲毫不加修飾的話，恐怕也落得格格不入的下場；台灣的教改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實各種文化，並無優劣之分，只看是否能隨時代的變遷而創造出更燦爛的成果；某些美國的制度，確實有其長處，但是那是植基於美式文化的基礎之上，當我們模仿學習時，還是得考慮本地的文化及想法，否則橘越淮之南而為枳的故事，只會一再重演了。

回首在美國的生活，雖然充實而且有趣，但那裡畢竟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因此在實驗室裡，在醫院裡，看到一點，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就整天在想如何拿回來應用。現在回國了，重新溶入台灣的生活，我深深覺得我們的腦力和智商，絕對不比我們在美國的同儕差（有時我都覺得超出許多）。照理說，我們也應該可以創造出優秀的成績才對；但事實不然。看看別人，想想自己，站在臨床服務及實驗室工作的第一線，大概唯有靠加倍的努力，才有機會能克服一點因為制度面的不同，所帶來的起跑點的不平等吧。願以此簡短的結論，與君共勉。